

山西文史资料 2000·1



周恩来与西喀努克国王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

走近陈永贵



为鲁迅先生画像

梁化之残尸分辨经过

ISSN 1004-5910



9 771004 591000

山西文史资料 2000·1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国王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

走近陈永贵

走近陈永贵

走近陈永贵

主 管：

山西省政协

主 办：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出版：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主 编：

赵政民

副主 编：

武胜利 王书福

执行编辑：

周志清

广告发行部主任：

王书福

通讯地址：

山西太原东缉虎营 35 号

邮 编：

030074

电 话：

0351-3045471 转 3116, 3119

定 价：

5.80 元

山西文史资料

本刊专稿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国王

● 刊首寄语

重读经典

征 敏 1

● 世纪回眸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

周恩来 4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国王

佟 春 6

走近陈永贵

孔令贤 20

● 峥嵘岁月

回忆北平和平起义

马青凡 15

和三位元帅看晋剧

刘 展 18

一份慰问志愿军的珍贵礼物

景思阔 19

● 共和国脚步

太原新闻接管组入城接管简述

鲁 兮 33

《山西日报》创刊前后

鲁 兮 35

《山西文艺》七年

韩文洲 38

● 史海揭秘

杨虎城将军遇害真相

叶 子 42

● 考证与争鸣

关于开国第一天

齐晋荣 48

SHANXI WENSHI ZILIAO

2000年1月 总第127期

风雨同舟

爱国民主战士杜任之

文史杂论

为鲁迅先生画像

姑射山中壮士碑

民国档案

梁化之残尸分葬经过

阎锡山与马歇尔的一段谈话

文史月报

开国将军的风采

火星上的狮身人面像

侵华日军屠城新证

夏商周纪年推定

秦始皇陵园新发现

婚龄称谓

诺贝尔的遗嘱

“杨贵妃教鹦鹉图”出土

澄清“北京猿人用火”之谜

本刊启事

征询意见

征集稿件

征求刊徽

李慕源 56

力群 58

马斗全 61

孙东元 54

徐崇考 52

41

55

63

62

63

62

63

62

63

64

64

64

国内发行:

《山西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内统一刊号:

CN 14-1023/K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5910

印刷

太原市财苑印刷厂

厂址

太原市水西关南街14号

电话

0351-4069145

邮编

030002

封二(上)

在山西省政协迎澳门回归演唱会上

封二(下)

国庆50周年献礼丛书——《阳光下的山西》

封三

七仙消银丸和它的发明者

封四

临猗县银病病克星 荆喜敬

设计制作

书海工作室



周恩来

这是个别开生面的会，只请了年满60岁的政协委员参加。陈毅和彭真两位副主席例外，他们是“替补老人”。我也只有到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过60岁。陈毅同志喜欢用《秋江》里的一句台词，说过了60岁又是一个新花甲。老道理新解，很好。

这几天我参加了政协分组会，见大家精神很饱满，在新中国大家都获得了新生。现在60岁以上的委员有383人，占全体委员的1/3还多。老年人占的比例很大也证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老年人得到了新生是可喜的事，但也要辩证地看问题。按照自然规律，人满了60岁，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一点了。有些人不服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有时熬夜多了就会出点小毛病。陈叔老（编者注：指陈叔通）也不服老，最近得了流行性感冒以后，才说服服老了。老年人不能和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比，但要做到人老精神不老。据说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40岁。现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也比旧社会好得多，大家精神愉快，长寿的人也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在新社会多活几年，多做些事，即使多看几年也是好的。

在分组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的问题，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

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程砚秋同志的艺术修养很高，解放后在政治上和作风上也有很大进步，但总还是有点孤僻。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也就流传不广。解放以后，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时，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了。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

在座的委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具体工作岗位的，担任着科学、医药、工程、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这部分同志很忙，有的连写东西的时间也没有。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高龄的委员精力集中使用，工作的年头可以更长一些。到各地视察既是政协委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要量力而行，有的可以不去，也可以就近视察。这次张文白（编者注：指张治中）先生提出在北京附近视察，我们就赞成。以后，可以把老年人组织在一起视察，少看多休息，不能和年轻人一样对待。另一种是年老体弱没有具体工作岗位的，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过去这方面的工作组织得不好，没有能使他们的力量发

挥出来。许多人在历史、科技、文化、艺术或其他方面是有研究的,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

我们都是过60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1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运动距今才40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现在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革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对袁世凯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顾颉刚先生说他想做些考据,但是政治运动很多,虽然有所得,却把时间都占了,在考据方面的贡献就少了。做考据工作只靠个人不行,要组织起来,也可以带点徒弟。

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

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在具体做法上要从容一点,不要像青年人那样,喜欢放“卫星”,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力的时候可以多做些。收集史料的工作一定要从容一点。

昨天有两个黄埔军校的朋友讲起三二〇事变和皖南事变,听起来很有趣,但我因有事只听了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二〇事变的情况就可以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发生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的进攻,怎么他又想跑走呢?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的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蒋介石在陈炯明、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在黄埔军校时他同苏联顾问闹翻了,也是走了又请回来的。他当权后,这种事又有过三次:1927年下野去日本,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躲回奉化,1949年和平谈判时退居幕后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三二〇事变前他可能想走,等到提清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就大举进攻。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蒋介石这一集团是有些东西可写的,在座的不少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梁思成先生没有来,康同壁先生来了,他们二位如果对维新派有兴趣也可以写。去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国外有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但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现在先提一提这件事,大家好作安排,具体的组织工作由政协常委会秘书处与各方面联系。

上面这些话可能对60岁以上的人有作用,所以耽误大家不少时间。

(本文是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政协1959年4月29日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国王

佟春

1976年1月8日,是全国人民极为悲痛的日子,因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音容笑貌并不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暗淡,反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的迭现而愈来愈清晰。当他逝世23周年忌日临近的时候,人们愈来愈怀念他。怀念他在“四人帮”疯狂猖獗不可一世的时候,他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有力地提起。怀念他为中国昌盛繁荣,不分昼夜,日理万机,所进行的超凡的工作。怀念他不畏艰难,为给祖国发展创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所进行的为新中国赢得众多朋友、赢得巨大声誉的人民外交工作。

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已故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这样评价他:“周是共产主义革命者,也是具有儒家气质的君子,是矢志不移的理想家,也是精于筹划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士,也是高明的调停者。若是由一个才于稍差的人来担任这样错综复杂角色,其结果定是思想和行动都发生混乱。但是周能够担当其中任何一个角色,或者说每个角色的特点他都兼备,而且丝毫不给人以勉强或前后不一的印象。对他来说,这些角色并不是因时而异违心地往脸上戴的

面具。这些角色是一位非常复杂和睿智的人物的不同侧面,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的政治经历的漫长和丰富。”尼克松在接触了周恩来之后,他才理解他的外交助手、最著名的外交活动家亨利·基辛格,为什么只和周恩来接触两天、进行过17个多小时的直接谈判,就异乎寻常地对周恩来赞美有加了。基辛格回国后曾给尼克松汇报说,他愿把周与戴高乐并列为他所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

处于第三世界的小国柬埔寨的国王、现年77岁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在其北京宅邸接见中国记者时,更是充满深情地回忆起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异常激动地说道:“在世界上和我的生命中,柬埔寨王国和柬埔寨人民最真诚的朋友和最可信赖的支持,就是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俗话说:‘患难中才能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1941年至1970年我在柬埔寨执政时,世界上有许多所谓的‘朋友’。但在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政变之后,这些‘朋友’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各自的政府不再理睬我,并对我表现出蔑视和敌意。然而,1970年3月19日,当我乘坐飞机抵达北京机场时,周恩来总理却组织了有外交使节出席的对一个国家元首那样的欢迎仪式。他与

我拥抱并对我说：“我不仅邀请我们的政府成员，还邀请外交使节前来欢迎你，你仍然是合法的柬埔寨国家元首。你一直忠实和有效地为你的人民和祖国服务。你是柬埔寨国家独立的象征。我们中国支持你。”国王一位情深地说，周恩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关心、支持着他，使他的柬埔寨国家元首的地位，尊严得到完全的维护和尊重。

西哈努克国王的这段讲述，概括了大国总理周恩来与他的全部交往。细挖这方面史实，展现其中的故事，将会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不移的外交原则，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独特的外交风格，以及周恩来总理极富魅力的外交个性和风范。

大国总理与王国代表

西哈努克熟知中国总理周恩来，始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当时，他才32岁，是位极富风采并在王位上有了13年经历的国家领导人。

诺罗敦·西哈努克于1922年10月31日，生于柬埔寨金边。他的祖父诺罗敦·苏他罗亲王，是著名的诺罗敦国王（1859—1904）的儿子，他认为自己的孙子应该成为柬埔寨的一位“狮心王理查”，便仿照印度佛教中一位传奇式王子的名字，给他起名叫“西哈”，巴利文意为“狮子”。外祖父西索瓦·莫尼瓦·莫尼旺是当时的国王，对西哈努克也充满期望，希望他“有一天占据着柬埔寨最高的职位”，预言“他的一生将是非凡的”。

在做过萨克斯和笛子演奏员的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的培养下，西哈努克从小就对音乐、电影、戏剧有了浓厚的兴趣，以至成了高雅的一位好的作曲家，他谱写的歌曲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为其同胞广为传唱。

1941年4月，复活节期间，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国王病逝，法国授意王位最高委员会尽快挑选王位继承人，结果正如其外祖父预言的那样，从中学回会过度假的19岁的西哈努克，被扶上了王位。当时他非常恐惧，怕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但迫于法国当局的意旨，也考虑到家族的利益，他还是住进了克马林王宫。

时光流驶了13年。为了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和平，1954年4月至7月，著名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大厦召开，西哈努克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从代表团的汇报中，开始熟悉周恩来这个响亮的名字。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周恩来是首席代表。他通身都着黑色，头戴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长裾外衣，带着张周天、王稼祥、李克农三位代表，于4月24日抵达日内瓦。

引起了各国人士的关注。出席会议的还有苏联、英国、法国、美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国的代表。26日，会议开幕。28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支持朝鲜关于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认为应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动，亚洲国家该进行协商，共同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停止扩军，禁止使用原子弹、氢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对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高棉、寮国等来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遗憾。第二天，瑞士等十几国欧洲所有的重要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发表了周恩来的发言。5月8日，周恩来又一次发言，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外范文同提出邀请柬埔寨和寮国抗战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的建议。

因有中国等政府代表的支持，柬埔寨获得了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权利。西哈努克派出以外交大臣普芬（也称狄潘）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他自己则住在离日内瓦不算远的法国南方一个偏僻的地方，进行遥控。西哈努克从代表团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周恩来十分关心越南、寮国、柬埔寨恢复和平后，成为自由、民主、统一和独立的国家，不参与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任何外国在三国中建立军事基地。西哈努克惊喜地获悉，大国总理周恩来还邀请柬埔寨代表团到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郊区的老邸共进午餐，品尝烹调考究的中国饭菜，并请普芬转达对西哈努克的敬意和祝贺。西哈努克曾十分惊奇地说道：“回到金边后，我的代表们向我称赞中国总理，他们被他迷住了……他们还对中国的美味佳肴大加赞赏。”

日内瓦会议之后，柬埔寨得到和平，避免了分裂，获得了完全的独立。1955年3月3日，西哈努克突然宣布退出王位，由他的父亲苏拉玛里特亲王担任国王，自己又变成了亲王。一个月后，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来到印尼的万隆，出席亚非会议，这才有幸结识了周恩来，目睹了大国总理的迷人风采，同时结成了忘年之好。

优雅风度与热情赞誉

1955年4月18日在万隆之印度尼西亚避暑胜地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是由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发起的，应邀出席的还有中国、柬埔寨、阿富汗、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共29国政府的首脑。这次因地址在万隆，西被人们

习惯地称为“万隆会议”的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当风度潇洒、镇定自若的周恩来和陈毅率代表团走进会场的时候，西哈努克及各国政府的首脑和代表们，一下便把目光集中到中国代表团人员的身上，用善意的、惊异的目光扫视着周恩来。这是拥有6亿多人口的大国代表团啊，这是在日内瓦会议上以睿智、活跃、精明又风度翩翩而出名的大国总理啊！不仅如此，前不

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当该机4月11日上午飞抵香港后，下午就改为中国代表团的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正当中国代表团加紧作出行准备的时候，缅甸总理吴努来电，邀请周恩来总理先去该国首都仰光，在亚非会议召开前与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碰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样，中国代表团就决定分两路前往：一路由周恩来、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飞成功后（当时中、缅尚未通航），再赴仰光，最后去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赴香港，于4月11日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直飞印尼首都雅加达。

周总理这一路，比较顺利。4月7日上午离开中南海，到达西郊机场。当正要离开候机室的时候，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将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启德机场加油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周总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遗憾的是这一重要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4月8日，周总理抵达昆明，仍放心不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事，于9日晚上9时，给在京的邓颖超打电话，要她转告罗青长查清情况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周总理还要求，把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启德机场按时起飞，便松了口气。但到下午6时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二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联系，大家立即紧张起来，周总理立即指示北京查明情况，如确系失事，火速救援。晚上，北京打来第三次电话，说飞机确已失事，周总理十分愤慨，指示有关方面查明原因。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坐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前往缅甸，中午12时（当地时间为10时30分）抵达仰光，住进了总统府。当天下午5时后，周总理、陈毅在吴努总理陪同下，参加了缅甸的泼水节。在举行了印、缅、中、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后，周总理一行的座机于4月16日凌晨1时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飞离仰光，经8小时飞行，在新加坡空域遇见雷雨区，只得迫降在新加坡机场。直到下午2时45分才再次起飞，下午5时30分抵达雅加达玛腰兰机场，住进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内。

另一路代表团成员及新闻记者等，是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久刚听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消息的各国代表，更对中国代表团表示出深切的关注。

所谓“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中国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失事事件。中国出席亚非会议，引起了退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极端恐惧和仇视，其特务机关派出大批特务杀手，妄图在周恩来总理前往万隆途中，实施爆炸和谋杀，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这一消息，早在3月初就被我方所获悉。荆棘遍布，险象环生，情况严峻，去，还是不去？做完阑尾炎手术不久的周恩来，没作多的考虑，决定还是要去万隆，按约赴会，去和亚非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亚非国家之间架起友谊之桥。

怎么去，周总理先是提出走海路，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然而，当时往来于香港和印尼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周时间，若有特务破坏，则很难保证安全。后设想由香港乘飞机直飞印尼，而当时我国无大型飞机可坐，也无直飞印尼的国际航线，只得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联系，决定租

1955年4月16日

(照原信、原格式抄出,标点为笔者所加)

接到这封检举信,大使馆和代表团工作人员加强了戒备,提高了警惕,并写出一份备忘录,递交给印尼政府。周总理则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会议之中。

这次有29个国家出席的亚非会议,起初意见分歧,观点极不一致。有的国家对新中国很不了解,有的国家领导人则是激烈反共的,还有的国家对本国华侨的经济成就嫉妒而又充满不满,担心中国会贸然扩张它的版图。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会议取得成果,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周总理机智、沉着地应对着一切,以他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着各种难题。

开幕后的第二天上午,周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分发了他的书面演说即“主要发言”。周总理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对和平的需要以及结束殖民主义的愿望,表示不能接受巴基斯坦与菲律宾的声明,即“东南亚条约”是一个防御性条约。周总理说,中国没有扩张主义的意图,强调要使亚洲团结起来,特别是共同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亚洲人民永远不要忘记一颗原子弹是在亚洲的土地上爆炸的。”明确表示中国对社会主义抱有信心。

大会的发言中,可以说充满了各种声音,观点分歧甚至对立。有的国家如菲律宾的卡洛·罗慕洛,在发言中咒骂共产党帝国主义甚至比资本主义更坏,指责中国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傀儡。在听了各国领导人的首次发言后,当

冲向蓝天,平稳飞行,机下是蓝光闪闪的大海,星星点点的海岛,似乎一切都显得很平稳,机舱里荡漾着欢声笑语。然而,危险却一秒钟一秒钟地向代表团成员身边袭来。这架飞机早就引起了蒋介石特务机关的注意,为暗害周恩来总理,蒋介石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精心策划,丧心病狂地要使飞机在飞行途中爆炸。主使人是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健夫,参与策划的还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香港航空公司清洁工周炳,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船员张祖顺从台湾基隆秘密运来的,交情报站特务李益民,李又交给另一特务再转交给了周炳。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降落在启德机场之后,周炳乘给飞机打扫卫生之机,把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飞机再次起飞,一步步向印尼靠近之时,定时炸弹的分针也在一分一分地划动。下午6时30分,飞机飞到了北婆罗洲撈越古晋100海里上空,突然爆出一声巨响,飞机被炸了。机上人员,除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副驾驶员狄克西特三人遇救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西哈努克和其他国家代表团成员,显然知道了周恩来总理的这段惊险经历,但他们还不知道周总理到印尼之后,蒋蒋特务还策划有新的阴谋。美国不是亚非会议的出席国,却派出了一个数十人的庞大“记者团”,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尼的恐怖组织“铁血团”,与印尼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到了印尼,匿居在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腊地区,指挥破坏活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于4月17日上午10时,乘飞机离开雅加达,抵达万隆住进达门沙里路10号当地华侨一栋别墅之后,19日午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送来的一份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信,完全证实了上述传言和消息。这封检举信写道:

敬启者,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雅加达(即雅加达)直属支部,于本年3月初奉台湾总统政府密命,组织28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暗杀队于3月10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20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20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40万盾。本月19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出发日期。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1日至5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



天下午周总理步履矫健地走上讲坛,按照他即席起草的讲演提纲作“补充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同时,会议应该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

周恩来总理的声音,加上他优雅的手势,感染和打动了亚非国家29个代表团成员的心,直接触及了他们提出的有关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会议的局面,也扭转了一些代表团起初的看法。“周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小心。由于他过于吸引人,因此,他显得更加危险。”包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起初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的风采,亲耳听取了周恩来的发言,留在他记忆中的却是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西哈努克曾这样说过:“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深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大会发言的第二天,即4月20日,周恩来在自己代表团驻地那栋别墅里,宴请了柬埔寨代表团。周恩来知道西哈努克非常讲究饮食,所以让随团厨师做了十分鲜美可口的中国佳肴。如此美味佳肴,显然是西哈努克过去从未品尝过的,经这次品尝,他才明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外交大臣着芬为何对周恩来带去的中国厨师的烹调技术赞不绝口。只是他当时还未能胜任茅台酒的酒力,他说道:“我必须当心中国人所欣赏的用来酿制的‘茅台酒’。周恩来在私生活上是以前肃刻苦而闻名的,但他又是一位喝了无数杯茅台酒以后仍保持头脑清醒的很能干的外交家。”在这次宴会中,西哈努克受到了中国总理的尊重,“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也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由此,西哈努克坚信:“无需担心他们会来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

西哈努克不仅对周恩来的待人接物、坚毅和蔼留下极深的印象,而且对其为会议所做出的贡献更是钦佩不已。亚非会议是4月24日闭幕的。原定上午8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起草的文件,就可举行闭幕式了。谁知到会场之后,

周总理得知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发生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代表坚持要把所谓“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辩去,从上午8时吵到下午6点多钟,中午休息了半个小时,还是定不下来。最后,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不再采用“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而改为“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有关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己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这样,协议达成,下午6时35分举行了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时30分,亚非会议才胜利闭幕。

对于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表现和贡献,各国代表的印象深刻,评价很高。有个在会议上对中国表现并不友好的国家代表,于会议结束时不得不承认:“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种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这样的评价是诚恳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亚非会议不仅以巨大成功载入了史册,而且在周恩来和有关国家努力下所形成的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由此产生的万隆精神,的确影响了世界,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仍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前不久,美国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在其《周恩来传》中,也称颂说:“1955年4月,周恩来取得了他在外交上最伟大的胜利。”

北国鲜花与南亚棕榈

1956年2月14日,首次访华的西哈努克首相在北京机场一走下舷梯,就看见了走向前来的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和盛大的欢迎人群。当他刚站在中国的土壤上,浓颜彩的少年儿童就献给他一束美丽的鲜花。

2月中旬,北京的气候还是乍暖还寒,而献给西哈努克的鲜花却是鲜艳的,香喷喷的。显然为贵宾的到来,周总理指示有关方面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在甚难找到鲜花店的当时,能把鲜花送到西哈努克手中,说明周恩来是费了不少周

并,并说明对柬埔寨王国是相当重视的。

早在上年万隆会议期间,新中国与柬埔寨王国还没有建交,柬埔寨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保持有领事关系,周恩来就以他本人和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西哈努克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西哈努克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同时也盛情邀请周总理访问他的国家。西哈努克回国后,1955年10月担任了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帮助父亲处理国内外事务,还主持了国家宪法的修改工作。现在,他终于抽身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面前,两人像老朋友一般热情地握手和拥抱。对于这样热烈的欢迎场面,西哈努克说,比他在马尼拉时所受到的欢迎“还要隆重得多”。

周恩来于当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欢迎宴会,并致词说:

“在万隆亚非会议上,西哈努克亲王亲自率领的柬埔寨王国代表团明确表示,柬埔寨始终坚持中立,决不被用作侵略基地。在我们相互接触中,亲王殿下维护柬埔寨独立和维护印度支那和平的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赢得了世界上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国家的敬佩。柬埔寨王国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听着周恩来总理如此真诚地高度评价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西哈努克非常激动,从心里感到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当晚,在周恩来代表团共进晚餐时,西哈努克特意也向周总理敬了茅台酒。

在2月15日的正式会议中,周恩来再次称赞柬埔寨王国的和平中立政策,并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无条件地对柬埔寨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正是这一承诺,柬埔寨的工业开始起步,多年后西哈努克感激地忆述说:“这一次中国之行,为我国奠定了真正的工业基础,因为我的朋友周恩来以他们政府名义,为我援建了三座大型工厂:即磅湛纺织厂、金边附近的岱陵胶合板厂和桔井省的川龙造纸厂,周和我都努力使柬埔寨实现在就地取材、加工和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即收购棉花、木材和竹子,提供棉布、普通胶合板、文化用纸等)的基础上的工业化。到1958年,中国又援建了三座工厂。”

2月16日晚,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去北京西城区的广济寺,出席中国佛教协会为西哈努克专门举行的宴会。

西哈努克的访问,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曾三次与柬埔寨贵宾举行了长时间会谈。毛泽东亲切地对西哈努克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有像你这样的东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这样亲切的态度,这样热诚的话语,使西哈努克兴奋、激动不已。

2月18日晚7时,西哈努克为表达柬埔寨对中国的敬意和感激,在中南海勤政殿将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赠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佩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胸前,并转交了赠勋证书。当晚,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签署了中柬联合声明。之后,毛泽东设宴庆祝西哈努克首次访华的圆满成功。

2月19日清晨,西哈努克前往上海、广州访问,周恩来率叶剑英等亲自到北京西郊机场送行。在飞机飞向天空时,看到周恩来仍站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挥手告别,西哈努克眼里充满了泪水。他从对北京的访问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是亲切真诚的,没有些许大国沙文主义的痕迹,中国是真正的礼仪之邦,对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尊重有加,礼遇周至。他预感到,此行播下的中柬友谊种子,将会很快萌芽、生根,长成大树,大树的荫荫将会抵挡炎热和风雨,使他的国家和人民享受到少有的舒适和温暖。

自西哈努克这次访问之后,中柬两国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了。

同年11月22日,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一道回访柬埔寨。西哈努克亲自到金边机场迎接,并陪同周总理访问磅湛省、暹粒省、贝昂省腊累镇等地,直到27日从金边机场离开。期间,周总理两次会见了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玛里特国王及王后,27日和桑文首相签署了联合声明。

1958年7月19日,中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同年8月14日至27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率国家代表团访华。24日,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发表联合声明。期间,周总理陪同贵宾参观访问了东北、天津、河北,并参观了保密性极强的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指示给柬埔寨援建了贡布省的乍格雷水泥厂,金边附近的苏东棉吉玻璃器皿厂,马德望省的第二纺织厂。

1960年4月,西哈努克之父苏拉玛里特国王,因糖尿病去世。正在印度、尼泊尔访问的周恩来、陈毅,能否按计划于5月上旬访柬?按原定计划前往,正值该国国丧,接待规格要受影响;如延期访问,等国丧过后,接待规格则能受到保障。周恩来和陈毅认为按原计划访柬可以来自吊唁病逝的国王,推迟访柬虽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总不如按原定期日访问为好,至于接待规格不必过分讲究,可以从简。于是,周恩来安排给代表团成员每人赶做了两套丧服,于5月5日上午9时,飞抵金边机场。

这天,西哈努克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此时的他,已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其父病逝后,理由由西哈努克接任国王,由于他于1955年放弃王位时曾宣布“永远不重

新登基”，如今仍继续坚持不继承王位，柬议会只得对宪法做了一点修正，规定在国王选出之前，可以选举国家元首。这样，经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联合选举，西哈努克成为国家元首。

当身着素装的周恩来出现在飞机舷梯上的时候，西哈努克感情激荡，感谢中国政府在他和整个国家沉浸在巨大悲哀之时所带来的安慰、体谅和友谊。在向宾馆行进时，金边市区臂戴黑纱的人群欢呼着，将周恩来的汽车围挤得无法行动，西哈努克陪同周恩来下车，一道步行，接受群众赠予的花环。

周恩来在宾馆略事休息，便前往金边桑园别墅会见西哈努克，表示慰问，并希望他节哀。下午，前往灵堂，向苏拉玛里特国王遗体致哀，并安放巨大的花篮。接着，又到国王御座殿拜会了西哈努克的母亲和摄政委员会成员。当晚，摄政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的舅父西索瓦特·莫尼勒亲王，在金边马林官举行了盛大宴会，欢迎周恩来一行。

第二天，西哈努克邀请周恩来以主人身份主持中国援建的柬埔寨皇家电视台的开播仪式。此后，又陪同周恩来参观了中国援建的几家工厂。这些工厂矗立在长有棕榈树和椰子树的原野上，雪白的厂房，碧绿的树林，显得特别优雅和俊秀。

5月9日，周恩来一行登上回国的飞机。在飞机升空时，他透过舷窗看见前来送行的西哈努克亲王，仍站在机场上仰视着座机，久久不愿离去。友谊就是这样，当人与人彼此感到陌生时，离散随意，毫无牵挂，而当一旦产生了友谊，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像珍珠与珍珠之间穿起了丝线，彼此牵连，难分难舍。西哈努克亲王对周恩来是如此，周恩来对西哈努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飞机呼啸着继续拔高飞行时，周恩来或许想到昨天即5月8日，西哈努克陪同他乘坐柬埔寨皇家海军巡逻艇游览白马湾，所看到的镶嵌海岸的南亚密林；或许想到掩映在金边、磅湛等地棕榈树、椰子林之中中国援建工厂宏伟而漂亮的厂房。从1955年4月万隆会议播下友谊种子，1956年2月北京送出鲜艳的花束，到1960年5月长戚柬埔寨棕榈和椰子密林中耸立的车间厂房，这说明中柬之间的信任一步步加深了，友谊一天天深厚了。国与国之间加深了友谊，那意义将是非凡的。

红地毯与复国之路

一晃过去了10年，1970年3月19日上午，当结束了对莫斯科访问的西哈努克乘坐飞机飞临北京机场上空的时候，心情相当复杂。

西哈努克出于友谊的这次出访，未曾想到竟使他和他的国家命运发生了又一次重大转折！他离开金边之后，柬埔寨局势在美国的策动下，骤然混乱起来。3月13日，反对西哈努克的游行示威越来越严重。3月18日，以朗诺、施里玛达为首的右派势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用坦克和武装士兵包围议会，强行通过了废除西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职务的决议，并将驻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柬使馆和越南南方共和国驻柬使馆，并出现了反对中国的口号。朗诺集团还扬言，不许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如若飞抵金边，就予以绑架或暗杀。同时还威胁各航空公司，如果载西哈努克回国，就将没收其回到波成东机场或暹粒机场的飞机。

在此危难关头，过去的一些“朋友”也变了面孔。用西哈努克后来的话说：“这些‘朋友’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各自的政府都不再理睬我，并对我表现出蔑视和敌意。”当此之时，他想到了中国，想到了周恩来总理，想到了过去访问中国时的许多情景——

1960年12月，西哈努克以国家元首身份和夫人莫尼克访问中国，周恩来和邓颖超设宴为其接风洗尘。这次访问，双方签订了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周恩来、陈毅于12月20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专列访问了南京、杭州，晋谒了中山陵，游览了明孝陵、玄武湖，参观了西湖、钱塘江边的六和塔、钱塘江大桥等，并在楼上楼聚餐。这样的接待，使西哈努克感到中国的热情和真诚。

就在这次访问中，西哈努克提议召开以解决老挝问题为主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吸收老挝的邻国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参加。周恩来对此大力支持，在1961年1月访问缅甸时，向该国领导人吴努和奈温作了转达，并说这一建议很好。由于周恩来的呼吁、支持，得到了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响应。这个会议召开后，周恩来多次说：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应归功于老挝人民的努力，同时也归功于西哈努克亲王。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西哈努克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中国对自己的尊重和支持。

在此后的日子里，西哈努克曾多次访华。曾经有两次，周恩来还长途跋涉，亲自到昆明和重庆前去迎接，并在当地和三峡、武汉等处参观游览，回到北京后，又和邓颖超多次设宴宴款待西哈努克夫妇。从这频繁而热情的交往中，西哈努克从心底里感受到中国的诚意和值得信赖。

正是由于有上述的亲身感受，所以在60年代初，西哈努克亲王率华大使兰·澳特把他三个儿子带到中国，交给周恩来和邓颖超，让孩子们在中国学校学习。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给三位王子找到了适合的学校，并妥善安排了教学、管理和生活。他还特意指示学校，对三位王子在汉语、英

文、数学、纪律、品德方面的教育要严格要求,指定专人以帮助,而在劳动课及思想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则不能按中国学生那样来要求。从这一事情上,西哈努克感觉到了中国对他和他的国家的重视及关照。

如今,朗诺集团发动了政变,回国无门,归家无路,应寄身何处?西哈努克再次想到了中国,想到了周恩来总理。事实上,周恩来早就为西哈努克的到来做好了各项准备:在金边发生反对西哈努克的游行示威和捣毁越南等国大使馆的骚乱后,他于3月14日午夜12时,紧急召见了柬埔寨驻华大使乃·瓦朗丹,对有关事项作出了安排,强调指出:要防止坏人也在北京挑拨,特别是在亲王宣布了要求北京的消息以后。并告诉说,中方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亲王的安全。之后,周恩来通知有关部门就亲王来京一事,布置了各项准备工作任务。

座机终于飞抵北京机场上空,西哈努克亲王关切地朝下观望,只见机场聚拢着欢迎的人群。走下舷梯,出现在眼前的是长长的鲜红地毯,是热情的周恩来总理、中国政府官员,还有各国驻华大使。完全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经受着国内压力和国际冷遇的西哈努克,看到此情此景,沉重的心放下了,眼睛不由得发潮了。

周恩来总理与西哈努克亲王同车驶往钓鱼台国宾馆。西哈努克走进自己的住处5号楼,只见会客室里家具典雅、整洁,墙上的字画流畅、动人,同时还摆有不少古玩,夫人莫尼克身边还有周恩来特意挑选的一批可靠的服务人员。周恩来亲切地对亲王说:“贵国一切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请您暂时把中国当作你的第二个家吧。”

周恩来陪西哈努克将一切安排好后,上午11时两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中午又为亲王夫妇设宴压惊。3月22日晚,又举行了第四次会谈,表示中国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西哈努克对此十分感谢,说道:“有中国的支持,我一定要坚持斗争,长期斗争也好,有很多困难也好,我决不退。”次日,他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担任主席。3月28日举行了第五次会谈。

毛泽东主席的著名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于5月20日发表。这篇名震一时的“五·二〇”声明讲道:“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这声明的声音,西哈努克是亲耳听到的,柬埔寨人民也是受到其震动而兴奋起来的。他们受到



的鼓舞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亲王住下来以后,周恩来对他的关心照顾是无与伦比的。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周恩来与他会谈多达30余次,对他及其领导的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支持是无法形容的,对他在衣、食、住、行、文化等生活方面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的。同时,还陪同西哈努克参观访问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当亲王身体不适时,周恩来特别安排他到北戴河疗养,还经常借邓颖超拜会他,到疗养胜地北戴河去看望他。另外,周总理还促成了西哈努克对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国的访问,增添了亲王的斗争信心。

1970年10月9日,金日成秘密访华,周恩来特意安排,使朝鲜元首与流亡中的西哈努克于10日秘密会见。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以后,周恩来于7月13日、15日分别到越南、朝鲜向其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从朝鲜回来的当天即15日晚上,又和叶剑英专门向住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作了同样的通报。

1972年10月31日,是西哈努克50岁生日,周恩来于当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祝贺,并邀请金日成及其夫人从平壤专程前来参加。

1973年10月17日,周恩来出现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里,亲口告诉住在这里的亲王说,将用法国飞机把住在金边的西哈努克的母亲接来,让西哈努克长时间患着的那颗心放了下来。能将王后撤下从朗诺集团严密控制下的金边接出,全是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交涉的结果。

在中国强有力的支持和柬埔寨人民的浴血奋斗下,1975年4月金边被收复,柬埔寨被解放。从1970年3月19

日上午,随着北京机场红地毯来到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就要结束其长达5年的流亡生活,返回柬埔寨了。当此之时,他怎能不以兴奋的心情感谢中国,感谢全力支持他、给了他无穷力量的周恩来总理呢?而此时的周恩来,已住进医院好长时间了,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更感到揪心的思念,决心要见到周恩来,去看望他,感谢他,并向他辞行。

8月26日晚上,他们来到了医院。医生预感77岁、重病缠身的周总理将不久于人世,怕会见加重病情,不想让总理会见外宾。而总理听说西哈努克来了,执意要会见,于是,和西哈努克会见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总理身体十分瘦弱,说话已十分吃力,但他还是艰难地回顾了柬埔寨得到重新解放的斗争历程,并说柬埔寨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主席在“五·二〇”声明中所说“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是一个英明的论断。他希望在场的西哈努克、宾努和乔森潘“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还指出:“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他感谢亲王来看望他,并抱歉地说,因身体原因不能到机场为亲王送行。

西哈努克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元首。

1975年9月,西哈努克回到国内。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到了金边。西哈努克和家人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不愿意相信周恩来这样的伟人能够离开人世。他们被悲痛淹没了,夫人莫尼克更是悲痛得哭出声来。一封很长唁电,由西哈努克、宾努和乔森潘署名,发到了北京:

“周恩来阁下是我们柬埔寨民族和人民的一位最亲密、最可信赖的战友。他是为建设我们柬中两国人民之间牢固的、美好的、纯洁无瑕的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了最重要贡献的一位中国领导人。”

为更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愿,西哈努克又专门发表谈话,称颂周恩来是“杰出的英雄和政治家”,“是柬埔寨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和伟大的朋友,为柬埔寨人民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第三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柬埔寨人民的心里。”

西哈努克亲王把周恩来引为做人的榜样,并一再讲:“我热爱中国,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个祖国。”前几年,他听说中国在拍摄电视片《百年恩来》,就亲自邀请摄制组到柬埔寨实地拍摄,并在王宫里接待摄制组,接受了采访。他还请摄制组参观了周恩来在柬住过的王宫,即他父亲曾经住过的地方,为详细介绍周恩来在王宫暂住时的情景,西哈努

克特别让人铺上了红地毯,以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最崇高的敬意。当《百年恩来》VCD光盘出版后,他特意买了不少,珍藏在柬埔寨的国家博物馆里。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但他的事业还在,并且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他的身影还在世纪风云中闪动,音容笑貌不仅还在感染着每一位中国人,而且在感染着每一位熟知他的外国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的日子里,西哈努克国王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又一次回忆起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支持和帮助。还特别告诉记者说,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忠实地继承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遗志,在柬埔寨人民经受的艰苦考验中,又给予了无与伦比的支持。

这位年已77岁高龄、精神矍铄的国王说:“自1955年以来,柬埔寨人民和我本人极为荣幸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亲密朋友的一员。从那时至今已经44年,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柬中友谊在世界堪称典范。同伟大的中国人民和她的三代杰出领导人在一起,柬埔寨王国和柬埔寨人民现在和将来都会保持团结和统一。”

从周恩来总理与西哈努克亲王交往的历史画面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高尚的外交风范。因为有这样的风范,我们才在世界上赢得了众多的朋友,赢得了世界的敬佩。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您个人的历史是一部教科书,我们从中学到的全是寓言,是教诲,是启示!

1999年9月24日晚11时

(责编 征敏)



回忆北平和平起义

马青凡

辽沈、淮海战役结束后，“华北副总”尚拥有重兵60万，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一大阻力。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南京政府逼傅军海运江南，保存实力；共产党重兵压境，将津唐京张分割包围，先打两头，斩断傅军南逃西窜之路，逼其起义，保存故都。傅作义则是以战的态度应付国民党，以平等的联合（即组织联合政府）希望于共产党。

早在1948年11月17日，淮海战役打响11天之后，傅作义就通过在北平的地下党给毛主席发出电报联系，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示派南汉宸（晋南同乡，1936年百灵庙大捷时，毛主席曾打电报给傅作义表示祝贺，并派南汉宸带慰问品和锦旗参加百灵庙抗战祝捷大会）先来平谈判，并报告傅在北平实际控制的空、陆军数量，但未收

到回音。傅又令女儿傅冬菊去约北平地下党负责人面谈，冬菊得到答复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但届时却没有人如约前来联系。至此，直到解放大军围城前，傅一直苦于不能把自己竭诚和谈的心意，直接和共产党、解放军沟通。

沈阳解放后，傅对留平、南下、回绥三条路，踌躇不决，问计于他的老参谋长陈炳谦。陈说：“北平是华北政治中心，要战要和均以不离开北平为上策。南下再受制于人，军心也将不可收拾。”因此，傅为了能战能和，把五个军事据点中的保定和承德两处放弃，加强平津与张家口主线的防守，以争取主动。现在虽然得不到解放军应有的回音，但走和平道路在傅思想上已成为主流。这是和他善于学习、虚心求教、广纳博采各种政治意见的作风分不开的：远在30年代任天津警备司令时，就与大公报社社长张伯苓，主笔张季鸾成为莫逆之交，到北平后又每周或拜访各大学专家教授，或请三五学者名流到总部，听取他们对时局和总部在辖区应采取的施政方针的意见。同时收听新华社广播的毛泽东各个时期发表的重要文章，以保证他能不囿于自己的历史地位和政治环境，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跟着历史潮流正确选择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平津战役是在辽沈战役结束41天，淮海战役进行37天之后正式开始的，即1948年12月13日。那天晚上10点，我给傅作义读完新华社新闻广播稿，刚回到家中，汽车就在门口，叫我立即收拾行装，赶快进城。第二天新华社广播说：傅作义昨晚西郊逃入城内时，尚有300多名家眷来不及带走，可见其狼狈之状。傅进城后，即将原由蒋系中央军驻守的各要害防地，改由自己的部队接替，以保证和谈能顺利进行。14日，指派《平明日报》（傅在北平的机关报）社长崔载之、记者李炳泉（地下党员）为代表，配备一部电台，乘吉普车秘密前往平山县西柏坡村，希望能见到毛主席，使命是谈判从张家口到平、津、唐全线和平解决。到16日他们却折了回来，说路上一再被拦截，要他们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联系。17日又出城先到程子华部（四十纵队），然后转到三汉平津前线司令部见到参谋长刘亚楼。当时谈判并不顺利，原因是很难找到一个能让傅作义接受的方案。最初中共建议傅像曾泽生那样宣布起义，给傅留两个军，要求把蒋系军师级的头目逮捕起来。傅认为这个方案无法实施，因为城内蒋系军兵力是傅军兵力的10倍，且暗中受蒋直接指挥，骤然通电起义，局势很难掌握。接着建议像郝洞国那样放下武器——投诚。“投诚”就意味着失败。傅作义一向有“常胜将军”的称号，虽然当时已是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但总未决一雌雄，这种说法，傅主观上也是接受不了的。

人们猜测中共此时对傅作义提出的和平建议，一是淮海地区正在酣战，无暇顾及；二是林彪所率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推迟了20天才徐徐进关，使华北包围部署尚未完成，不能作无实力后盾的谈判，因此，不作高一级的接触，暂搞一些旧有模式来延磨时间，也是情理中的事。

为什么傅作义此时对和平谈判这么积极呢?我认为,傅作义已认识到蒋家王朝即将崩溃,中共即将成为中国主人,借自己实力尚存的时候,与中共作对等的谈判,在“联合政府”中仍得一席之地,但“和比战难”。打仗只要下个命令就行了,当军人的都习惯于这一套。而“和”先要打通每个人的思想。否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了扫清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他要了解处在围城中的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动态,进行针对性的说服教育工作。

进城以后,北平地下党领导学生游行,高喊“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声音,愈益高涨。为促进傅走和平道路制造声势,女儿冬菊劝他:不要性急,只要有诚意,和平一定能够实现。冬菊每天还把傅的动态报给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转报中共中央。在兵临城下的危局中,傅作义开始了他向和平进军计划的试探性工作。

高级幕僚有的主和平,有的主坚守,有的主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行动,才能得到好处。

傅嫡系师级以上军官,多数唯傅之命是从,认为傅是“福将”,跟上他走没错过。少数人认为和谈通电是兵临城下的“哀鸣”。

一天,傅召总部研究室主任李国伟,谈对大局的看法。李说:“目前社会上有和、战、走三种说法。我认为战是死路,走为下策,和是上策。但和需要大智大勇,也要审时度势,切忌轻举妄动。”

此时,华北战事更加激烈。12月23日,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全部歼灭。24日张家口解放,傅军除司令官孙兰峰一人脱逃外,其余5.1万人全部被歼,打乱了傅作义保存实力、作为和谈筹码的整个计划,这对傅作义的打击太大了。那时候我们住在怀仁堂东二楼,有好几天听到傅总“啊,啊……”的大喊声,蹑脚声,觉得怪可怜的。后来,傅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嫡系高于密议如何办?参谋长李北屏说:“回绥,青龙桥过不去;回太原,河北平原尽是民兵;下海还有路,但南方无我立足之地。”大家问那该怎么办?李说:“总司令已派崔毅之出城与解放军接头,不知情况如何?”傅说:“他们住了一星期,也没见到中共中央负责人。只是和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双方条件距离太远。北屏,你还是准备好打仗吧。”

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了43名一级战犯名单。30日,新华社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一连串的政治攻势,使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官兵胆战心惊。傅作义在听读新华社广播时,凝神静思,品味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分析,特别是谈到国民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失败原因,以及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结束内战的愿望时,表情开朗。但傅列在一级战犯名单内,所以在听读战犯名单时,命我慢读三次,说明他在掂量“战犯”与“和谈”能否两全——傅这时闭门谢客陷入极度痛苦的处境之中。李国伟到中海南求见表示慰问,傅破例接见了

他。并问李见到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没有?李意识到这时傅考虑的中心问题不是战与走,而是和谈能否成功,中共能否见客。李回答说:“见到了。不是都‘战’了么?一个巴掌拍不响。不过,我认为这时公布战犯名单的用意不是消极的,战犯是指‘战’而言,不‘战’也就无所谓‘犯’。”良久,傅说了一句:“只要人民国家有利,个人一切均可置之度外。”这时,傅已深知“对等”的谈判没有资本,蒋介石也无力还手。现在中国共产党是要一统天下了。但也不能坐等城破。他醒悟到两年多的内战,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特别是华北人民,从日寇铁蹄下刚站起来,又堕落到内战的火坑中挣扎,如何承受得了?北平230万市民是无辜的,不能为傅一时之誉,作孽无量之民,为后世耻笑。人民需要和平,这是历史潮流,不管再有千难万险,都必须朝着和平的道路走下去。

再说北平这座古城,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东方建筑的杰出代表,谁也不忍,谁也不应以战火灭了之,落个千古罪人。本来中国的四大古都,洛阳历经火毁;南京建筑平又经天京之变;西安可谓历史最悠久,然而前有项羽一炬,后有安史之乱,其辉煌雄伟之势大减。独有北平城经过元、明、清三朝经之营之,保存完好,可称世界建筑艺术之冠。今天,中国共产党已到了夺取全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时候,当然应尽最大努力保护她,傅作义作为一个地方官,有义务为保存古城尽可能地完璧归还人民。因此,北平城周围并没有什么钢筋水泥工事,也未作“涿州守城”之计,这就为双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创造了前提条件。解放军兵临城下是起威慑作用;傅作义派出出城是想维护他40年戎马生涯之尊,特别是跟随他的几十万“八年抗战”的清贫之士的最后归宿。所以他不能西退绥远,东走海上,南往东南军政长官;甚至夫人、儿子当时均在香港亦不能一走外国了之,所有这些义为和平谈判增添了讨价还价的难度。然而由于傅作义的首行行动,主动诚意;由于有毛泽东精通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指导思想;由于中共一贯主张“爱国不分先后”;由于傅作义自1933年长城抗战,1936年百灵庙大捷,直到太原守城、驻军河曲,与中共的融洽合作关系由来已久。因此,中共耐心等待者。古人云:度德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

北平通过和平解决,其必然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但因北平城内的蒋系驻军是傅军的10倍,所以和谈只能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尽管如此保密,蒋系十三军军长石觉还是风闻傅要和谈,把大炮口对准南海,并说:和谈有失军威又损国威,谁要和谈我就和谁过不去。傅作义这个人,无论作什么事,一旦认定了怎么办,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审时度势,决心彻底向人民靠拢。1949年1月6日,第二次派使出城,派1937年曾代表他到延安向毛主席要回50名抗大学生做二十五军政工人员的山西大学教授周北峰,借南京大学教授民盟盟员张东荪,前往蓟县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进行谈判。周北峰9